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3.798

“杯葛”的源起及其在当代台湾地区文化中的嬗变

张义明¹

(¹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杯葛”(Boycott)泛指一种抵制活动。在当代台湾地区,“杯葛”兴起自上世纪末的立法机构,是由党团主导的,以停缓议事、阻挠程序进行为手段的政治抵制活动。它糅合了政治抵制行为与议会暴力行为,成为带有台湾地区特色的政治文化现象。随着各党派民意代表席位的消长,“杯葛”的滥用已超出政党政治策略的范畴,丧失了合理性。它反映出当前台湾地区政党政治陷入内耗,折射出民粹文化对台湾地区民众生活方式的深度入侵。这种畸形性的文化也暴露出政党政治主导下台湾地区民众文化认知的割裂倾向。梳理“杯葛”文化发展的源流及其演变,结合 2014 年台湾地区部分“台独”势力策动的非法冲击所谓“立法机关”的事件,有助于认清政党斗争的本质,亦能更好地理解当代台湾地区政坛纷乱现象的成因。

关键词: 杯葛; 议会; 民粹主义; 政治娱乐化

“杯葛”,即英文词 boycott 的英译。其本意为“抵制”,指“与个人、团体或国家断绝全部或部分关系”^[1]。它源于 19 世纪末英国公爵欧勒的田庄经理人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欺压佃户后遭联合抵制的事件。自 20 世纪初,“杯葛”一词被广泛使用于各类中文出版物,旋即与“抵制”一词混用。随着时代变迁,中国大陆业已将“杯葛”一词替换为“抵制”,主流媒体难觅“杯葛”一词的踪迹。但在当代台湾地区,“杯葛”一词仍被广泛使用,被赋予了与“抵制”相比更为丰富的内涵,并从经济抵制行动扩大至政治抵制行动。时至今日,“杯葛”现象已成为研究当代台湾地区政坛时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在发挥政治博弈功能之余,它的畸形性得到凸显,并以民粹形态介入到台湾地区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中,是当代台湾地区政党政治缠斗闹剧的写照。

一、“杯葛”的本土化和政治化

“杯葛”系音译词。1920 年太蕤在《民觉》发表题为《我的杯葛主义的观察》一文,文中提到:“boycott 这句话,在中国流行快了一年了,简直成了社会上一个问题。”^[2]其陈述或可反映“杯葛”一词流行的语境。不满于“一战”后列强的分赃,中国有识之士对日、英等国抵制洋货的运动如雨后春笋般铺展开来。张伯泉在《杯葛》一文中赞扬了人们抵制日货的行为,谓其“识者,莫不称为快”。但同时他也夹杂着对这一抵制浪潮的忧虑:“中日原为唇齿之邦,吾人又何忍弃好寻仇,而言抵制哉。”^[3]这或是作者对 1919 年抵制日货运动失控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反思。以至于十年后抵制日货运动再次兴起时,仍会以 1919 年之混乱作为反面典型:“当年秩序纷乱,军队巡街,日侨被殴,华商之拥有日货者,迫焚于市。”^[4]张伯泉的文章着重分析在抵制日货这一经济行动中诸主体的不同动向,虽有提及政治上的“杯葛”,但始终没有将其置于论述的中心位置。与该文类似,此时期各报刊中“杯葛”的对象多为帝国主义列强,国人以抵制洋货的经济行动试图反制其侵略行径。

自 1919 年抵制日货运动后,中国民众或自发、或在政治团体的领导下,开展多次对日、英、法等列强的“抵货”运动,其中以抵制日货尤甚。以至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类报刊对“杯葛”一词进行解释时,不乏直接将其视为“同盟经济绝交”或“抵货”运动者。此时人们凡说起“杯葛”,多为国与国之间的抵制商品运动,系“一种报复行动”,亦为“经济上压迫力量”^[5]的行动。当作者提及与政治选举等有关的抵制活动时,一般会冠以“政治杯葛”(political boycott)以示区分,意为“协约不选举某人为总统或某项官职者”^[3]。而此类政治行动难以在民国时代“军政”“训政”的土壤中得到孕育。

直到中国国民党退居台湾地区,并恢复议会政治、以及后续“解严”并开放“党禁”,“杯葛”才重新被赋予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含义。而究其政治意味发端的历史,仍可上溯至 20 世纪 40 年代后由国民党主导的议会

作者简介: 张义明(1995—),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大众文化理论。

政治。一如李敖所说,“一切所谓‘议会政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说破了,只是有名无实而已。”^[6]在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仅有青年党等小党派参与,可谓是国民党的“一言堂”,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抵制;退居台湾地区以后的“万年国会”时期,从1969年起才开始有“党外”人士担任民意代表。少数有异见的民意代表,乃是“吃国民党剩下的鸡骨头”,很难发表实质性意见。一旦有威胁到统治的异见性提案,国民党便会祭起“纪律”以动员民意代表以压倒性多数将其否决。“解严”以前的台湾地区,所谓“党外”人士并无施展拳脚的空间,而随着“党禁”的解除,台湾地区政治光谱日益复杂,派别纷立,党派团体之间的对抗才日益白热化。民进党源自反抗国民党专政的所谓“党外”人士,固然会采取逢国民党必反的态度。它善于操弄街头政治,鼓动民粹,其创始人暴力问政、围攻议会等行为,也为后来“杯葛”活动横行埋下了种子。

某民进党创始党员在80年代曾以“暴力问政”闻名。其于1987年殴打他人的行为,被视为当代台湾地区第一起“议会暴力”行为,1988年其更是因跳上立法机构主席台殴打时任副负责人而广受注意。1989年1月17日,民进党煽动民粹,以“诉诸群众”的方式包围立法机构,并殴打、侮辱其他民意代表,引发震动。此后的三十余年间,议会“杯葛”始终与“议会暴力”深度捆绑,党团围绕立法、“阁揆”发表施政报告等发生的政治“杯葛”,多造成武力相向的局面。

蓝营与绿营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非全然来自其政见之异同,更多则是源于“统独”等大政方针之尖锐矛盾,以及国民党身披涉及族群问题的历史包袱。纵然千禧年后的国民党试图弱化政治颜色,试图“由深(蓝)入浅(蓝)”,甚至走向中立,但大众观感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即可达成之事。因而在选票和使命的双重掣肘下,蓝绿的对抗日益尖锐,这也促成了在立法机构与县市议会中,党团之间的冲突与对撞。

值得注意的是,“杯葛”作为抵制活动并非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专属”。具有台湾地区特点的“杯葛”政治文化现象,则是更晚近的诸如“朝小野大”的分立政府等政治更迭所引起的,这也催生了后续诸如“程序杯葛”(亦称“技术性杯葛”)等现象。在各国家、地区的议会政治质询环节中,激情演说者将愤懑转化为武力,上演“全武行”的事件并不罕见,但像当代台湾地区,以党派、群体进行勾连,试图以“正当程序”拖延立法、议事正常流程的进行,并延宕数十年以至于成为“传统”的现象则较为少见。根据所谓《立法委员行为法》,占据主席台、阻挠议事、胁迫他人、携入危险物品等系非“理性问政”的违规行为,但仍然屡禁不止。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杯葛”,混杂了利用常规政治博弈的“程序杯葛”与非常规的“暴力问政”模式,使得其颇具台湾地区“特色”。当局对“杯葛”现象模棱两可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其对“法统”的因循,故而导致“杯葛”现象在当代台湾地区成为屡见不鲜的政坛乱象。

二、议会“杯葛”:台湾地区政治缠斗乱象之体现

当代台湾地区的“杯葛”现象集中体现于立法机构和各县、市议会之中。从历史发展来看,2000-2016年间是台湾地区政治“杯葛”的一段高潮期。民进党第一次主政时期,台湾地区政坛处于“朝小野大”的格局,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多次对当政的民进党的立法、政策规划进行抵制;而随着政党轮替,绿营则有样学样,对当政者的诸多议题进行抵制,并煽动组织藉由政治抵制引起的社会活动。从延长议事流程以拖延立法,到霸占主席台、封锁机构大门,再到拳脚相向、使用各类道具互殴,议会“杯葛”活动日趋成为台湾地区媒体关注度较多、影响力较大的政治话题。

由于“程序杯葛”这一将一般议案暂缓编入议程的方式具有合法性,法案的推迟延宕则在立法机构内屡试不爽。民进党第一次当政时期对监察机构负责人的提名因“朝小野大”的状况而反复搁置,司法部门一度裁定此种行为违反所谓“宪法”,但其也不得不申明“从良性的角度而言,(杯葛)可促进更广泛之政治参与和讨论,有助于形成更周全的政策或解决方案。”曾长期担任立法机构的负责人也曾向媒体重申:“虽然霸占主席台是不应该的事,但是警察权并没有法律授权,任何警察都不能妨碍或干预司法。”然而,媒体对“杯葛”的态度并不像政客那般宽容。据统计,台湾地区“中时新闻网”近十年(2012-2021)来的各类新闻、评论以“杯葛”为题者共有636条,其中涉及立法机构和各县市议会政治“杯葛”的高达491条,占总数的约77%,平均每7天便有一条相关新闻。“议事瘫痪”“妨害公务”“倒阁”“突袭”“占领”等高频词汇反复出现,正如“杯葛”行动的套路般使民众眼花缭乱。“多少年来,几无例外,只要新任行政机构负责人就职向立法机构提出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总是无法顺利上台。”当代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杯葛”行为已经从政治策略演化为政党缠斗的伎俩,几乎将民生福祉置之度外。此种逢对方必反的态度已不再是某一个街头政治党派的特点,已经融入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之中。

议会的政治“杯葛”需诉诸党团的合纵与连横,民意代表个体难以独立完成。由于民意代表发言的时间会受到一定限制,各党团为了“杯葛”相关议题,会使用各类阻绝议程的手段。其中,立法机构的程序委员会在提案环节可视其轻重缓急来决定排入议案的顺序,而民意代表则可借审查之由申请复议、干扰议事等手段

阻挡议案通过。为了使法案、议题顺利通过，立法机构还会召开临时会，以至于近年来休会期仍有常态化的临时会，讨论多为重要性较低的非突发性议题，被社会各界广泛诟病为缺乏“民主宪政”精神的体现。

纵然有学者认为，当代台湾地区议会中“政党对于没有争议性的法案则有共识不去阻绝，而倾向将之通过，创造双赢的局面。”^[7]但在诸重大议题上，为了获取更多的声量，蓝营和绿营之间往往呈现出两极化特点，其互相之间的攻讦则置社会公义于不顾，为了反对而反对，从而瘫痪议事进程，使政策影响下的经济社会发展趋于停滞。例如，在开放美国牛肉入台和含“瘦肉精”美国猪肉入台议题方面，由于执政党地位的变动和议会席位数量的变化，国民党和民进党对相似事件的决策与认知发生了陡转。民进党以“时空背景不同”搪塞，实则已经陷入了政党恶斗的泥淖。

三、“杯葛”以民粹姿态入侵民众生活

台湾地区两大党派对开放美国肉制品进口一事的态度反复无常。当政者因所谓“外交”利益考量，力图开放含瘦肉精美牛、美猪等入台，而在野党势必会对此进行反对。无论在野党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无论其宣称如何为民众考虑，其煽动民粹以阻挠对方达成政治利益的真实目的已然图穷匕见。而议会“杯葛”活动和其煽动的有组织的民众抗议活动成为其操弄手段的两个向度，以传递“民众的声音”为幌子，让民众为其牟取政治利益的过程背书，俨然是以民粹姿态入侵普通民众生活的表现。

有学者认为，台湾地区“选举民粹”^[8]正抬头于民进党主政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时期。民进党擅长利用“异质性矛盾”，从而“在民众中制造严重的对立和冲突”^[9]。它一贯试图操纵“省籍”“族群”等敏感话题，并为反对者冠以“历史罪人”的大帽子。这些议题在台湾地区民众中颇有市场。而本不擅长操弄民粹的国民党，也照猫画虎，试图利用民粹式民主的手段来争取选票。

“选民有时候支持民粹政党，并非他们喜欢民粹，而是这些民粹政党没有讲实话。”2012年，时为在野党的民进党因反对美牛开放，其立法机构党团进行了五天四夜、超过120小时的全体总动员，以霸占主席台的方式阻挠时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对相关法律事项进行修改。而数年之后，时过境迁，民进党当政时期也力推含瘦肉精美国猪肉进口，此时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也对此进行“杯葛”，一度被称为“焦土战争”。国民党不仅在议会祭出猪内脏作为攻击道具，另组织“秋斗”游行，并组织“泛蓝”媒体撰写评论以抨击民进党视人民为无物，“把人民当猪头”。但就两党宣传的话术与实际行径来看，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中，两党都放弃了自身原则，模糊政见。其为人民谋福利是假，为收割政治利益是真。

另一个典型的案例则是2014年由部分“台独”势力策动的非法冲击所谓“立法机关”的事件。民进党煽动民粹，并将其美化为一场正面的抗争事件。从政治策略来看，该事件是民进党及绿营反对两岸签订“服贸协议”的“杯葛”行为的扩大化，但从更广泛的文化层面来看，它则是“台独教改二十年的成果总验收”^[10]。该事件的诸位始作俑者，政治观点甚至比民进党的台独路线更为激进，但他们的行径仍大体在民进党控制的范围之内。无论台独势力如何将其粉饰为一场正义的活动，其阴谋终因其明显的“绿色”旗帜而彻底暴露，而大多数民众则是被裹挟于其中，难以发出质疑的声音。

在操弄民粹的社会运动中，组织者藉由所谓“民意”，行违法违规之事。民进党在该事件中煽动激进分子对政府机关进行冲击的行为，实质是“僭越代议制民主”^[11]，试图损毁业已岌岌可危的政府权威。在议会政治“杯葛”难以奏效之时，民进党选择以煽动民粹的方式开展更大规模的街头政治运动，从立法机构内部和外部分别展开攻势。该事件上承自与民进党有关的另外两场事件，分别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些事件具有较高相似性和关联度，体现了民进党街头政治的“路径依赖”。

民进党对两岸议题的操弄、给反对党“抹红”等行为，充分反映出该党试图以大陆“威胁”为幌子来控制民众，而其一贯的政治话术则是将反对者推向“极化”。在“非蓝即绿”的政党斗争中，“杯葛”行为激化了台湾地区社会不同政见间的冲突，促使民众政治观念乃至文化认同产生割裂。围绕在以“蓝”和“绿”为中心的台湾地区人民，难以过问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是非，而只能以选边站队的方式簇拥在理念相近的人群周围。从历史经验来看，曾跃升为“第三大党”的“亲民党”、所谓“时代力量”都是某一阵营的侧翼，并不具备主导某一颜色的实力。而近年来号称新“第三大党”的台湾（地区）民众党，虽持中间路线的立场，但其立场不够鲜明，预期发展也不甚明朗。无论台湾地区社会多少人呼吁“走第三条道路”，建立“第三党”，他们的政治光谱颜色或无法跳脱蓝绿色的差别，或只能在蓝绿色间显得无比黯淡，这也是台湾地区民粹化民主政治体制下难以刨除的痼疾。

四、“杯葛”做秀与政治娱乐化

当代台湾地区的议会“杯葛”本为政党主导下的行为。然而在议会暴力的加持下，台湾地区的“杯葛”更沦

为某些政客的个人秀，并带有相当强烈的娱乐化倾向。

2016年民进党再度上台后，国民党在立法机构的席位已无力抗衡绿营的绝对多数。与街头政治出身的民进党相比，国民党在议会斗争中的“战力”较为孱弱，且党内多股势力各怀心思，缺乏团结。在议会“杯葛”中，国民党党团常装模作样，看似声势浩大，有做戏之虞。纵然有所谓“甲级动员”和各种道具的加持，却也难掩其做秀的真面目。而民进党，则更是在“翻版”国民党的基础上，更善于动用党纪武器来威慑党员，以打造一致对外的团结假象。

台湾地区数量繁杂的政党从体制上而言几乎都是国民党的翻版。胡适早在194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及：“中山先生终究是爱自由讲容忍的人，所以在他的政治理想系统里，一党专政不是最后的境界，只是过渡到宪政的暂时训政阶段。”^[12]然而他为“宪政”张本并未换取后来国民党“准备结束训政”的趋势，直到80年代这一局面才得以改变。李敖则指出：“民进党在走国民党的老路”^[6]。他认为，民进党选择使用与国民党几乎完全一样的体制，呈现出亦步亦趋的姿态。故而李敖对此时的正当乱象已经呈怀疑态度，并提出了相应的构想：“政党是松散的……这种政党是自由结合的：竞选前来也欢迎、去也随便……他们没有庞大的党工人员，他们有的是共同理想与政见的结合。”^[6]然而李敖的观点最终也只能流于一种理想。在看似迥异的政治光谱中，国民党、民进党两个党派的政治逻辑何其相似。

在2021年美国瘦肉精猪肉进口一事中，本被誉为“战斗蓝”的几位政客在议会和媒体上的反差，更引起大陆网友的反感。近年来，国民党在“统独”立场上的摇摆不定，使大陆民众对其好感日益下滑。身为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素有“女战神”之称的某位政客，和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就猪肉进口一事共同接受媒体采访，二人似依据剧本来出演宣传片一般，片中二人互动亲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这样的惺惺作态，引起了不少关注台海问题的大陆网民反弹。该政客在议会“杯葛”上因“战斗”而捏造的人设，也因此饱受质疑。

此外，在政党“杯葛”时使用各类道具，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做秀意味的体现。李敖曾使用“芭比娃娃”等道具来喻事明理，引发了议员、民意代表等在质询环节使用道具的热潮。而在议会“杯葛”时，政党党团会利用各类制品作为辅助“武器”，以引起立法机构更为混乱的局面。在冲突结束之后，更有两党议员被爆出私交甚笃，而在立法机构里的大打出手只不过是表演给民众看的戏码。

政客本身的自我营销行为，也是“政治娱乐化”的一部分。不同的是，综艺节目中对政客的模仿可被视为消解政治严肃性、权威性的尝试，但它们都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趣味性、亲民性。当政客力图打造自身人设并努力获取曝光度的时候，其试图掩盖问题的意图就更加明显。作为曝光声量极高的政治活动，在立法机构内的议事流程不仅由官方进行直播，亦在各类媒体、自媒体的添油加醋中不断发酵。当代台湾地区议会中，民意代表已然将“杯葛”这一非常规行为当成了自己工作的一部分。党团和民意代表共同参与的“杯葛”行动看似以“双赢”的方式拉抬了两方面的声量，但挂在嘴上的民主政治正深陷泥淖，他们却视而不见。

五、结论

当代台湾地区的政治“杯葛”使得民主进程日趋僵化，围绕两党缠斗的社会氛围非但没有温和多元化，反而更加撕裂，陷入无休止的非蓝即绿的争斗。“杯葛”本身作为政治博弈的策略，本应成为政党协商崭新的突破口。然而台湾地区的政治“杯葛”演变为畸形的内耗和做秀，对其政治文化生态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令人担忧的并非仅是“杯葛”所带来的议会停摆，其所衍生的社会层面的相互抵制更令人感到忧虑，在“极化”标签分裂各政党支持者的社会大环境下，个人的处境也会随政党政治的风潮摇摆不定。

两党政治“极化”愈演愈烈，政治“杯葛”无休无止的状况，恐怕难以被两党自身所改变。台湾地区的民主社会面临的诸多疑难杂症，或需要通过体制的“内科手术”才能治疗。

参考文献：

- [1] 夏征农. 大辞海·世界历史卷[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281.
- [2] 太蕤. 我的杯葛主义的观察[J]. 民觉, 1920, 1(1): 144.
- [3] 张伯泉. 杯葛[J]. 政学丛刊, 1920, 1(3): 50-52.
- [4] 反日消息: 十一、星洲侨胞杯葛日货之概况[J]. 反日周刊, 1928(6): 98-100.
- [5] 经济智识[J]. 国货月刊, 1935(11): 37.
- [6] 李敖. 民进党研究[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9: 65, 278, 284-285.
- [7] 叶怡君. 法案审议与议程阻绝——立法机构第三届到第六届的分析[D]. 台湾(地区): “中正大学”硕士论文, 2009: 37.

- [8] 尹茂祥, 钟厚涛. 台湾地区民粹主义的政治演进及影响[J]. 台湾 (地区) 研究, 2020(2): 60-68.
- [9] 王程. 民粹主义在台湾: “民粹式民主”的生成及其危机[J]. 台湾 (地区) 研究, 2022(1): 72.
- [10] 江振滔. 颜色革命的机制——以 2014 某台独事件为例[D]. 台湾 (地区): “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 2022: 19.
- [11] 李龙. 从某台独事件看台湾 (地区) 民主[J]. 台湾 (地区) 研究, 2014(6): 89.
- [12] 胡适. 胡适全集: 第 22 卷[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685.

The Origin of "Boycott" and Its Evolu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the Taiwan Region

Zhang Yiming¹

¹*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Generally speaking, Boycotting is a counteracting activity. In contemporary Taiwan region, the boycott emerged from the legislature at the end of the last century. It refers to political boycotts led by parties that use the suspension of proceedings. It is a combination of political boycott and parliamentary violence, has become a uniqu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with Taiwan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oycotting abused as parties' popular representation changes. It reflects the current vicious figh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in Taiwan region. It also reflects in populism of Taiwan region. The boycott has changed some cultural views of Taiwanese regional people. Analyzing the culture of boycott helps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political party struggle,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confusing current situation.

Keywords: boycott; parliament; populism; political entertainment